

专题论文：多元族群与多元文化

Feature Articles: Multi-ethnic and Multicultural

马来亚国语运动中的印尼经验 ——以独立建国时期的华社 为个案*

The Indonesian Experience in Malayan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During Independence Period:
A Case Study on Chinese Community

吴小保

(GOH Siew Poh)

摘要

马来亚在二战后经历了剧烈的政治变动，并于1957年宣布独立。作为新兴国家，它们除了面对如何打造国家机器，也必须接手处理殖民历史遗留下的多元族群问题，亦即应该如何建构国族身份？就此而言，学习与推广马来语成为国语，是建构民族/国族的重要途径。为此，马来亚与新加坡华社在独立建国时期，积极地参与政府提倡的国语运动，推广并学习马来语。然而，鲜为人注意的是，这场马来语/国语运动背后，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使然，却具有跨国流动的因素，当中“印尼经验”发挥了一定作用。本文将指出，透过不同的跨国途径，“印尼经验”参与了马来亚的马来语/国语运动、马来亚民族主义运动。这说明本土性与跨国性在经验上与概念上都不是决然对立的。

*感谢评审针对本文的一些概念界定以及论证方面提出疑问与建议，让我得以改进本文不足之处。

吴小保 华社研究中心副研究员。E-mail: gohsiewpoh@yahoo.com.sg

©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Kuala Lumpur 2017

关键词：国语运动、本土现代性、跨国、印尼、华社

Abstract

After independence in 1957, Malaya had faced a series of problems which include ways to create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in a multi-ethnic and multicultural society. In order to create a united Malayan nation,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which promotes the learning of Malay language was uplifted among the Malayan nationalist, including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is mass movement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during 1950s and 1960s. I will argue that the National/Malay Language Movement was influenced by the “Indonesian experience” in the shaping of Malayan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different transnational pathways, on the national level as well as in civil societies. This shows that locality and transnationality are not dichotomous but intertwined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Chinese community.

Keywords: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local modernity, transnationality, Indonesia, Chinese community

一、前言

1920年代中，马华文坛出现“南洋色彩”的呼吁，主张透过本土化来推进文学的发展。这似乎是一个文坛由于内部与外部之间的连接，而必然出现的结果。它往往与想象的边界相关，形成相对于其他群体的主体性。换言之，它构成了一套辨识原理——姑且勿论此原理究竟合理或不合理——区别自我与他者。因此，对内它具有凝聚力，对外则具有排他性。随着辨识原理而来的，是一套价值体系的建立：自我优先于他者。这似乎也是作为群体的人类活动，所无法避免的事实。

实际上，“本土化”在更早前已经在当地文学公共领域实践了。19世纪中末期，由于内外引力与推力，迎来中国的大移民时代，大量劳动阶层移居南洋。随之而至的是一批又一批文人。他们当中有些是清朝派遣的官员，更多则是因为参加政治活动而流亡海外。

1881年，清朝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创办“会贤社”，教化当地缺乏

文化教养的中国籍子民。1891年接任领事的黄遵宪，将之改名为“图南社”，相对于左秉隆的文化宣教，黄遵宪加强了本土的关怀，突出南洋色彩。至于非官职的文人，如邱菽园则扮演另一种角色：流寓文人（高嘉谦2004）。这类流寓文人还包括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党派，随后而至的还有革命党人。各派势力在南洋竞逐自己的政治主张，间接或直接地推动侨社三宝（学校、报刊、社团）的发展，打开南洋各地的文学与政治公共领域。这类文人的文学实践，除了带有忧患的中国国族意识，也表现出对“本土”的兴趣。例如，邱菽园就曾实验性地把马来语（如马干makan；马莫mabok等）植入旧体诗中，尽管这类关怀往往仅是“异国情调”，却见证流寓经验中语言实验与在地的关系（高嘉谦2004：49）。

其实，不仅文人雅士经历本土化，生活于斯土的平民百姓，无可避免地也需要掌握当地语言文化，使得日常生活披戴本土色彩。新客华人于19世纪末开始，出版了不少华马雏形词典（杨贵谊2014）。这说明了日常语言与本土的连接的可能性。换言之，紧随着劳动者、文人迁移南洋的，是一套民间与知识阶层的本土语言文化的炼成。进一步说，这种随同移民而来的“中国经验”与“在地经验”之连接，无论是私领域（个人社交、市场）或公领域（文学的、政治的），无不受到不同意识形态、政治局势、人际关系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然而，必须指出，至少在二战前，这种在地知识（主要指新客文人），是在“中国-南洋”的双重结构意识中进行的。此中国-南洋结构，带有中心与边缘的垂直关系，一方为起源、中心，一方则是目的地（或过程）、边陲。附属于此的则是价值体系的建立：自我优先于他者。中华文化优越于土著与土生华人的文化。故此，本土的限度，也就往往被此价值体系所框限，只是流寓文人眼中有待启蒙的客体，或中国文化本位下的“异国情调”，而不会是必须被内化于自我中的属性。

无论如何，这种本土化的限度逐渐地被突破，尤其是战乱的流离以及在殖民地被剥削的经验，渐渐地把人们推向独立建国的时代浪潮，本土化就不再受限于“为他者带来启蒙”或“异国情调的凝视”，而是尝试把他者内在化于自我之中，以便建构新兴的国家身份——一种透过译介来挪用

他者本土文化来创造新兴民族身份的现代本土性理念。

过往人们在考察这种新兴民族的观念时，往往仅从“中国”与“南洋/东南亚”之张力中来探讨。其实，在中国-南洋的垂直关系之外，南洋内部亦由于人员的流动与网络的建立而有着错综复杂的交往经验，这方面往往没有得到应有重视。这种南洋内部的横向交叉连接，在历史上所在皆是，例如1920年代南洋色彩在马华文坛提出后，1929年上海的真善美书局出版了一本小说集《椰子集》，此书普遍被认为是早期印华文学的重要代表作，《东南亚新文学史》就指出：“这本集子被视为早期印尼华文小说罕见的成果。它表现了作者对南洋社会下层人民苦难生活的同情和责任感，以及对彷徨中的知识分子的关心。”（庄钟庆编2007：414）《椰子集》作者郑吐飞生平不详，论者根据该书内容咸认同他拥有“印尼经验”。根据苏尔梦（Claudine Salmon）的调查，郑吐飞与马华文学关系密切，是《南洋商报》副刊《曼脱罗》的供稿者（Salmon 2010：405）。因此，可以说，南洋色彩的主张以新马为基地，辐射到周边地域，穿透不同殖民地行政边界，抵达印尼。这种区域内的流动与连接，不仅发生在新客，也包括土生华人，蓝天笔是另一个例子。他生于1836年苏门答腊的明古鲁，通晓马来文（爪夷文、罗马字母）、中文、英文与荷文，是个成功商人与土生华人作家，生意遍布马来群岛各地，与新加坡改革派峇峇华人（如宋佛俭）、各邦马来苏丹（尤其是柔佛苏丹阿布峇卡）皆有往来。在文学方面，他活跃于印尼华人马来文坛以及新加坡峇峇马来文坛。尽管印尼与新加坡当时分属不同殖民地，并且使用不同的拼写系统，但蓝天笔凭着极高的语言天赋，掌握两种拼写系统，轻易游走于两个文坛之间（Salmon 2010：228）。

有鉴于上述所提的南洋区域内部之交往经验，我们可以假设，华人南来的“中国经验”与“在地经验”之连接——本土化，不仅仅是个个别的跨语活动，同时也是个跨域网络下的产物。这跨语-跨域的网络，背后隐含了南洋内部在文化与政治方面的中心与边陲的生态。本文尝试针对上述的假设，从跨语-跨域的文化网络，探讨马来亚华社的本土现代性追求¹。相对于国家本位的视角，文化网络的参与主体不受限于“国民身份”，而

强调流动、跨境、跨国。然而，尽管如此，文化网络不必然与民族国家决然对立，反之网络与国家处于一种辩证的动态关系中。² 本文的讨论，将以马来亚华社的国语/马来语运动为中心³，尝试论证马来亚（含新加坡）与印尼的跨国连接，如何在华社面对国家身份认同转向时，为其新兴民族的想象提供本土化的资源与条件。

本文将透过考察于1950、60年代参与马新印三地华社的印尼语/马来语运动的知识分子，来探讨上述流动的跨国网络与本土性之关系。首先是二战期间从新加坡流落到印尼的中国知识分子胡愈之。其次，则是印尼华人廖建裕，他于1950年代末从印尼到新加坡留学。最后是1960年代初从新加坡到印尼留学的杨贵谊。这三人以新加坡为活动中心，是那年代马来亚的重要政治经济空间。此外，这三人正好代表不同意识形态的华人知识分子：胡愈之认同中国，廖建裕认同印尼，杨贵谊认同马来亚。他们的流动途径与经验也颇不相似，但都直接或间接与马来亚民族意识⁴的塑造相关，并参与到马来语运动中，揭示了“印尼经验”在马来亚民族主义中的作用与意义。

最后，本文希望透过“马来亚国语/马来语运动或马来亚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印尼经验”的考察，进一步回答以下问题：本土性是否必须置于一国境内来理解？如果它与身份认同相关，则它可能被外来权力剥夺吗？本土性意味着什么，它具有什么现代意涵？

二、印尼作为马来语文化中心

一般论者都同意，马来语与文学的现代化，可以追溯至19世纪中末期的文师阿都拉（Abdullah Munshi），因为其重视马来语文的态度，以及透过书写，促成马来文学的现代化/去封建化——文学的中心从宫廷转移到社会。继承文师阿都拉衣钵的，无疑是19世纪末柔佛王国创立的“语文知识教学联盟”（Pakatan Belajar Mengajar Pengetahuan Bahasa，下称语盟），一个尝试现代化马来语文的语文组织。然而，随着柔佛的现代化运动最终仍无法避免沦为殖民地的命运，语盟也就沉静了下来（Jumaat 1989; Mohd

Sarim haji Mustajab 1989)。

相反地，19世纪末，荷属东印度殖民政府开始推动马来语为官方语文，并于1908年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创办图书局（Balai Pustaka），大量地出版书籍，推动马来文的发展。十年后，1928年的“印尼青年宣誓”大会，马来语被提倡为团结语言（bahasa persatuan），改称印尼语（bahasa Indonesia），并提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语言”（Satu Bangsa, Satu Negara, Satu Bahasa）的民族主义宣言。从此马来语文与文化的中心从马来半岛转移到印尼，印尼文化、政治思潮发展迅速，并跨过海域，影响众多半岛马来青年——特别是受马来文教育的平民。马来左翼民族主义的发展，其中一个影响途径正是来自于印尼（Ahmat Adam 2013: 55-68）。历史学家阿末阿当在比较印共陈马六甲（Tan Malaka）与马来青年协会（Kesatuan Melayu Muda）主席依布拉欣耶谷（Ibrahim Yaakob）的论述后，认为后者显然有前者的影子（Ahmat Adam 2013: 70-71）。此外，许多苏丹依德利斯训练学院（Sultan Idris Training College）毕业生都表示，印尼图书局对他们影响甚大，该局出版品往往是学生的精神粮食（Abdullah Sanusi 1966: 57）。这都说明印尼在现代性方面对半岛马来青年的影响作用。

印尼作为马来语文中心的事实延续到二战后。1949年印尼建国，废除荷兰文，立印尼语为国语。这个历史发展鼓舞了半岛马来人。从1950年代初开始，半岛马来人（包含新加坡）以五十世代作家行列（Asas 50）为主，一连举办了三届的马来语文大会（Kongres Bahasa dan Persuratan Melayu）。大会商议的几个主题，除了毫无争议的“立马来语为国语”、“成立国家语文局”要求之外，以五十世代作家行列为主的一派，由于主张罗马字母化马来语文，而遭到了马来语文理事会（Lembaga Bahasa Melayu）的反对，后者积极捍卫爪夷文的地位。最终在彼此双方的相互妥协下，确立了一个折中方案：以罗马字母为官方语文（Bahasa Rasmi），但不废除爪夷文。实际上，在1950年代之前，马来半岛的马来文报刊与书籍，几乎都是使用爪夷文。罗马字母则主要由非马来人使用。五十世代作家行列之主张罗马字母化马来语文，其动机除了因为罗马字母比起爪夷文

是更好的表达工具，以及为了迎合非马来人学习马来语文之便利⁵，更重要的是为了避免因为拼写字体与系统的差异，导致印尼与马来半岛在文化上的分离。换言之，这是战前大巫来由民族国家理念在战后幻灭之后，在语言文化领域的一个复兴的替代方案（Syed Hussein Ali 1959）。事实上，由于当时半岛马来文化的贫弱，也无可避免地必须借助较为发达的印尼语文化来改善自身的不足。统一双方语文的拼写字体与系统，也意味着书籍市场与各种文化资本在区域上的一体化，从而能够加速马来语文化的发展。⁶

半岛马来语文的贫弱，不仅仅是文库方面的不足，在威望上也被视为无法与强势的英语比较，更无法履行作为“国语”和“官方语”的职务与功能。尽管面对各方质疑，马来语在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时，仍然被立为国语。随之而来的，是马来语文精英与官方合作推动的语言本体与地位规划，以及打造国民的语言认同。在独立前一年，自治政府接纳第三届马来语文大会的提议，成立国家语文局（Dewan Bahasa dan Pustaka），一个仿效印尼图书局的机构。国家语文局总监赛纳西尔在1967年回顾十年奋斗时，就指出：“国家语文局创立之初，马上面临两个糟糕与令人难过的局面。第一，在大众观感中，马来语水平低落。第二，作为国语、官方语与知识语，马来语尚有不足之处。”因此，他指出，在他领导下，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国家语文局扛下两个任务。第一，必须把马来语建设为现代语文（bahasa Modern），第二，使之成为学校的教学媒介语（Syed Nasir 1967: 4）。该机构为了推广与建设马来语，出版各种图书与刊物，如创办《语文月刊》（Dewan Bahasa）（1957）、《社会月刊》（Dewan Masyarakat）（1963）、《学生月刊》（Dewan Pelajar）（1967）、《文学月刊》（Dewan Sastra）（1971）、《文化月刊》（Dewan Budaya）（1979）等，成为国内最大的马来文出版机构。

在一边着手建设马来语的同时，马来语文精英还必须撰文回应各方的质疑。就后者而言，马来民族主义者的“被殖民”屈辱经验与昔日“被殖民前”的美好传统，不断地重新被召唤，从而把马来语文的落后归因于殖民主义的剥削与边缘化。赛纳西尔就曾指出：一个语言的水平高或低、

进步或落伍，与一个民族的地位有关，而马来语在过去虽曾高度发达，但随着一个又一个马来王朝落入殖民者手中，马来语失去了它原来的活力（Syed Nasir Ismail 1957）。

除了援引惨痛的“被殖民”经验以及召唤美好的昔日传统，印尼在推广国语方面的成功经验，往往也成为被援引、称颂的例子。学者依斯迈胡先就说过：“马来语发展成‘印尼语’是我们语言历史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Ismail Hussein 1966: 53）在引述了大量古典马来文献，说明马来语文在过去已能够扮演好统治、行政语言角色之后，作家哈仑指出：“作为最有力的证据与例子，我们看看现在的印尼，它们把马来语命名为印尼语，并规定为该国家与民族的统一语，成为他们的沟通语、法律语、知识语。数十个大学都以印尼语为教学媒介语。”（Harun Aminurrashid 1966: 68）

印尼不仅在建国方面成功，文化文学的量与质，也是马来亚、新加坡无法比拟的。一位在1960年代初到印尼求学的学生，曾留下当时的观察：

雅加达市场上卖的各种各样印尼文书太吸引人了。这里的书店不但多，而且规模也大。新加坡最大的马来文书店哈新，若与这里的书店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我还记得，1956年我第一次到印尼时，已深深感到他们的出版情况与素质远比马来亚进步。在那里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印尼文书籍。过后当我在印大念书时，我更有机会浸濡在非常适合我学习兴趣的环境里。

（杨贵谊2006：247；251-252）

因此，在语言、文化乃至政治等各方面，印尼毫无疑问在二战前乃至二战后，成为部分马来半岛文化人的中心。此中心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于新客华人的“中国-南洋”双重意识，前者提供后者现代养分，在某个意义上，可以说是作为其现代性的动力之一。

必须指出的是，正如南洋与中国之间存在着认知价值与利益的张力，印尼与马来半岛亦复如此。一部分印尼民族主义者所主张的“大印尼主义/大巫来由主义”（Indonesia Raya / Melayu Raya），其支持者主要是出

生于马来半岛的印尼后裔，因为他们有着原乡情怀。但对大部分受封建传统束缚的马来人以及其他的非马来人，此政治理念不具吸引力，甚至加以排斥。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就曾担忧“大印尼/大巫来由主义”会使马来亚成为印尼的殖民地（Ahmat Adam 2013: 82-84）。故此，印尼作为中心，不多不少仍受到半岛马来人本土派与非马来人的提防。

在上述情况下，马来亚的马来社会与华社，于1950年代展开了马来语/国语运动，争取立马来语为国语，并将它发展为现代化的语言。在此语言运动中，印尼的影响力不可小觑，当时重要的文学团体，如五十世代作家行列就深受印尼影响（Syed Hussein Ali 1959）。此外，由于马来语文化的各种匮乏，因此不得不借鉴印尼的资源。这包括了师资的引进，如印尼新作家行列（Pujangga Baru）大将Sutan Takdir Alisjahbana就于1960年代受聘为马来亚大学马来文系主任。南洋大学早期的几位马来文老师，如Muhammad Rashid Manan、李全寿，皆来自印尼。除了高教，估计当时也有不少印尼的私人教师前来半岛填补空缺。譬如《语文月刊》读者Wong Ling投稿追忆她已逝世的印尼籍马来文老师Che' Hanan（Wong Ling 1960）。相信，在师资匮乏的那年代，这样的情况应该相当普遍。

其次，如前所述，本土马来文化的文库贫乏，印尼文书籍成为马来青年的精神粮食；另一方面，华社在透过译介追求本土现代性时，没办法单纯仰赖本土马来文库，印尼文库成为重要的挪用资源。当时市面上流通不少印尼民俗、语言与文学的译著，如杨夷编译《为祖国立功》（1959）、谷衣译《爪哇民间故事》（1960）、《南苏拉威西民间故事选》（1966）；李全寿编译《印尼民间故事》（1960）、林青译《汉那非与柯丽叶》（1962）等。除了单行本，单篇文章也很多。以1962年的《南洋文摘》为例，便有谷衣〈印尼的名作家宋达尼〉（第三卷第一期）、萧铭〈印尼名作家玛拉·罗斯利〉（第三卷第三期）、陈达生〈印尼侨生文学〉（第三卷第四期）、李立〈旗（印尼短篇小说）〉（第三卷第五期）、萧铭〈印尼名作家简介〉（第三卷第六期）、马达〈印尼侨生的文学〉（第三卷第六期）、萧铭〈印尼名作家简介〉（第三卷第八期）等。

然而，必须指出，印尼译介作品在马新社会的流传，不能简单归因于本土文库匮乏，还有其他原因。根据当时的一位翻译人堂勇的观察，当时大部分翻译作品都属于民间故事一类，社会性质的或现代文艺比较少。其原因在于“版权所有”问题。由于版税增加了成本，出版商因此对翻译书不大感兴趣，一些报馆与翻译工作者也担心侵权而不刊登或不翻译本土的作品，而宁愿翻译来自外国的印尼文学（堂勇1962：95-96）。

最后，由于印尼是当时马来语与文化的中心，顺理成章成为升学的目的地。1960年代初，南大生廖裕芳、陈达生、杨贵谊先后到印尼大学升学，研究印尼语文。根据杨贵谊回忆，在当时，印尼大学还有一批接受奖学金的半岛马来学生在当地就读，其中不乏日后成为马来学界与政界的翘楚，如语言学专家Asmah haji Omar、前马大副校长Abu Bakar Hamid、前国家语文局副总监Khalid Hussien、前马来西亚文化、青年与体育部长Muhamad Rahmat、前马来西亚国民大学教授Siti Hawadeng（杨贵谊2006：249）。

三、印尼的流寓经验：胡愈之

1940年代初，日军在马来半岛长驱直入，一海之隔的新加坡文化界翘楚，纷纷分批搭上舢板，逃到邻近的苏门答腊岛避难，在当地度过漫长的三年零八个月抗战岁月。

这批在印尼避难的文化人名单一长串，包括郁达夫、张楚琨、王任叔（巴人）、胡愈之、沈兹九、汪金丁、包思井、陈岳书、王叔旸、洪丝丝、杨骚、高云览等，均为当时文坛与文化界风云人物。除了这些已成名的作家文人，也包括当时尚年轻的，如威北华，战时随同父亲来到苏门答腊，并一度参与印尼共和军、印尼文坛活动⁷。以此来看，流寓印尼的马华人作家，阵容不可谓之小，日后对马华文教界必有影响。这批流寓文人，不仅在当地逃难、生活、工作、学习与交友，更在战时与战后，以印尼经验来创作与著述。当中部分人，譬如郁达夫、巴人，更被学者归纳为印华作家（庄钟庆编2007：414-420）。实际上，他们大可被视为印华文

学中的马华文学，或反过来，马华文学中的印华文学。除了著述，他们也译介了不少印尼文学、马来文学，同时也推广印尼语和马来语的学习。

然而，重要的是，“印尼经验”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对于马华的民族主义又有何意义？在本文，“印尼经验”被理解为，透过印尼——无论作为实体或精神——获取的经验，同时此经验必须对一个社会文化产生影响力。换言之，仅作为个人生长背景毫无社会影响力的印尼（私己）经验，并不包含在本文讨论中。

下文将以胡愈之为例，回答上述的问题。⁸ 胡愈之于1940年12月抵达新加坡，担任《南洋商报》主笔，积极走动于文化界，二战时期原本计划逃到苏门答腊，再经爪哇返回中国，却在申请准证时遭荷属殖民官员刁难，错过逃难的良机，最终被迫逗留在苏岛。战后返星，继续文化工作，1948年离星经香港返回大陆。⁹

1942年2月，胡愈之与其他星洲文化界人士在苏门答腊这资源相对贫乏、生活条件相对困难的地方，意外地打开了前往马来世界的通道。胡的妻子，沈兹九就坦率地说：“回忆战前在新加坡的岁月，好像是一个小中国里，到了苏西，才使我真正认识了南洋的一部分。在印尼文中，窥知了一些印尼的历史、民族性以及他们的风俗人情。这些，假使住在新加坡，是不能去了解的。”（胡愈之、沈兹九1985：31-32）

胡愈之一行人在印尼避难之余，组织了“同仁社”，分享生活、习得与时局分析；同时，每隔两三个月，就派人到各小岛与苏门答腊东部与难友交换情报。此外，他们也组织了研究会，将研究所得写下，订成小册子，供内部传阅（胡愈之、沈兹九1985：29-30）。他们向当地民族学习印尼语，因为当地华侨一般看不起印尼人，认为他们没有文化，固此不懂得印尼语（沙平1951：1）。后来胡愈之与沈兹九离开匿藏多时的巴耶公务来到马达山。在这里，沈兹九尝试翻译印尼文小说《去日里》。胡愈之则开始写《印尼语言研究》、中篇童话《少年航空兵》等（胡愈之1985：103）。

战后，胡愈之重返星洲，在陈嘉庚、陈岳书等人资助下，分别于1945年12月和1946年11月创办《风下》杂志和《南侨日报》¹⁰。这两份刊物都

以为中共争取海外华人支持、推翻国民党为己任。然而，胡愈之当时的政治立场并非完全一面倒向中国，反而在其社论中反映出其同情第三世界国家的反殖民斗争（崔贵强2012：16）。因此，此时胡愈之已与大部分战前的流寓知识分子所持的“中国-南洋”意识有所区别。后者对南洋的关怀，往往仅限于“异国情调”或慈善（如改善教育、革除陋习）。而前者则已开始关注侨居国的民族自决的独立运动。胡愈之在解释《风下》的刊名时就指出：

怎样去理解“风下之国”，怎样去倾听“风下之国”的被压迫被奴役的人们的呼声，反映出他们的愿望与要求，这是我们《风下》创刊者的希冀。由于此，把我们这个小小刊物，题名为《风下》，以配合“风下之国”如火山般爆发的民族独立解放斗争，维护远东的和平安宁，其中也包括中国内部为民主和平团结而进行的斗争。

（胡愈之、沈兹九1985：109）

胡愈之进一步表示：“《风下》针对华侨中流行的不顾侨居国的‘大国民主义’，和脱离祖国的‘不问国事主义’，进行批评引导。”（胡愈之1985：111）这种双重任务，尽管强调华侨必须同时争取中国和当地的民主与自由，但胡愈之却认为，中国是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线，中国的胜利，就是东南亚各民族的胜利。且中国的斗争是眼前紧迫课题，东南亚则是长期斗争，故中国的民主任务更迫切。基于此，崔贵强认为，胡愈之乃是“中国本位思想的”（崔贵强2012：24-25）。

然而，尽管胡愈之有着“中国本位思想”，却不能排除“世界主义”对他的影响。意即，其思想即便以中国为本位——中国民主化优先于其他国家，但在相当程度上其背后的考虑与观察位置，却带有世界主义倾向。这一点，可从他主编的《风下》看出来。

战后胡愈之主持的《风下》以国际政治为主轴，其关怀面除了大国政治博弈，亦关注弱小民族的斗争。¹¹ 1948年1月该杂志刊登马来文月刊《黄金》驻印度记者西曼的报导〈克什米尔人民的斗争〉（之文译）¹²（《风

下》第110期)。除了政治层面的关怀,他也开始着手本土文化译介的工作,刊登印尼或马来文学译作,尽管这方面做得不太多。如以沙平的笔名不定期发表若干篇〈马来谣〉(《风下》第101、109、111、116期等),或者刊载马来或印尼短篇小说Rawan Hiba的〈篱笆害了谷〉(之文译)(《风下》第116期)、峇希·万拉的〈自食其子的泥鳅〉(之文译)(《风下》第131期)、苏拉巴蒂的〈报复〉(金丁译)(《风下》第130期)等。此外,也曾刊登林之文的〈谈印尼语〉(《风下》第60期)。站在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立场,《风下》不仅关注印尼和马来文学,也关注印度文学。例如查太基的短篇小说〈旱季的乡村〉(思默译)(《风下》第126期)。根据第123期〈编后记〉,此文译者是一位来自印度的朋友。而根据第126期〈编后记〉,推荐这篇小说的出发点是,“从这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印度农村中血淋淋的现实。”换句话说,推荐的原因乃是了解各地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斗争。

整体上,这种对弱势民族的关注,背后所立足的“世界”,是冷战格局下的新旧世界的历史认知。早在1947年11月,胡愈之就在〈一个世界的长成〉中提出社会主义新世界与资本主义旧世界的斗争格局。“当然,这旧世界与新世界是势不两立的。新世界的长大与发展,使旧世界感到衰落与灭亡的威胁。因此一切依赖剥削奴役制度以生存的人们,都把苏联看作死对头,要用诅咒,威吓,战争,以消灭苏联,越是苏联强大了,越是非把苏联消灭不可。”、“新的世界是长成了,它要继续发展,以代替陈腐的黑暗的旧世界,这是历史的命令,历史的命令是不能违抗的。”(《风下》第100期)

从以上种种实践来看,他们对世界各地,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与文化,如马来亚与印尼的文学与文化活动,都有深入的掌握。这当中,他们流寓印尼的经验,直接地提供他们打开本区域文化、历史的认识缺口。透过流寓的机会,吸纳了印尼语言、文化、历史等知识。但这种实践却不能视为完全归于“马来亚民族”的,而是中国—(第三)世界双重意识下的产物。

四、从雅加达到新加坡：廖建裕

生于1941年印尼雅加达的廖建裕，于1958年前往南洋大学就读，初修中文系，后转历史系。在当时，印尼当局规定，任何离开印尼返回中国的华人，都不得再踏上印尼土地，这导致了许多到中国升学的印华青年被迫留在当地，并形成了战后中国印尼学研究的重要生力军。¹³从1956年开始，马华社会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大学，成为东南亚最高华文学府，为本区域（包括印尼）华裔子弟提供升学的另一选择。一位当时国立印尼大学留学生的观察：“中文在印尼的发展，虽然不比新马两地的发达，但中文在印大的地位，似乎可以和英文系争衡。……目前，在中文系就读的学生人数，从第一年到第五年，共有四十多名，多数为印尼人。……还有一个独立性的中文图书馆，有专门的图书管理员。”（杨贵谊1961：23）这说明在新秩序时期之前，印尼的中文环境不至于太荒芜，但却无法与新加坡比较。廖建裕正是在上述脉络下，从华文相对边缘的雅加达，前往南洋大学念书。¹⁴

在新加坡期间，廖建裕正好碰上马新华社的学习国语运动，这样的语言热潮他应该不陌生，因为早在1950年代初，印尼华社就掀起了学习印尼语运动。而廖建裕在印尼时期，已经开始创作与翻译，尤其是对中国唐诗新诗与印尼新旧韵文，一读再读、一吟再吟。他也把自己的创作与翻译投稿到当地华印文报刊发表¹⁵（谷衣1987：65）。

学习印尼语热潮始于1950年代初，彼时印尼共和国刚独立。荷文被废，印尼语立为国语，地位一时水涨船高。荷文学校已遭关闭，华校仍得以维持，但开始面对政府的严厉管制，设定种种条件。例如，规定印尼语文为必修课程。又或者，规定必须通过印尼文考试才能获得教师准证。新加坡人包思井¹⁶在当时指出：

自从印尼联邦共和国成立后，印尼语就变成印联的国语。依照印联法律的规定，一切用文字记载的文件都应该以印尼语为标准，于是在印尼华侨中就掀起学习印尼语的高潮，大量需要用中文来注释的印尼语读物。

(包思井1950: 无页码; 粗体为引者强调)

学习印尼语, 除了因为当局的规定, 也因为生活上的需要。当时的一本语法书《实用印尼语》的编者就指出: “由于以上事实的存在, 并且因为华校学生的大部分, 将永久定居于印尼, 而在这里继续谋生, 所以印尼文, 亦将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上极其需要的语文。”(程次芳等编著1954: 无页码) 此外, 这种学习印尼文的热潮, 背后也不无被当局威胁的意味。印尼前外侨教育司司长郑扬禄在〈印度尼细亚语与华侨〉就指出:

政府不但希望本国公民合作, 而且也希望作为本国居民的外侨给予合作, 特别是那些在本地出生或来印度尼细亚居住多年(数十年)的外侨! 一个已经在此地居住了多年而还不能使用印度尼细亚语同印度尼细亚人谈话的外侨是会引起不良后果的, 他会无意地伤害印度尼细亚人的感情, 因为他可能给人家造成这样的印象: 他似乎并不重视也不尊敬有关国家的语言。

(郑扬禄1959: 7; 粗体为引者强调)

在上述各种复杂因素之下, 印尼语运动展开了, 大量的书籍纷纷出版, 例如, 语文教材与工具书方面, 有李毓恺编《中华印尼大辞典》(年份不详)、温锡涛编著《中华大辞典》(1951)、包思井编《印尼语语法》(1950)、《高级印尼语读本》(1953)、李全寿著《印尼语读本文法合编》(1953)、程次芳等编《实用印尼语》(1954)、杨凡编《印度尼西亚语外来语辞典》(1961)、林立编《印度尼西亚语常用简字略语辞典》(1962)、善努等编《简明实用印汉辞典》(1963)等。杂志方面则有《印尼语文》(1957)、《印度尼细亚语学习》(1959)等。译作方面, 立人编著《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选》(年份不详)、李全寿编译《新编印尼语故事读本》(1956)、沙里洪、青夫等著《遮阳眼镜》(1960)、巴赫波伦编《印尼谚语选: 印中文对照》(1961)、苏艺和礁石编《印度尼西亚现代短篇小说选》(1962)、叶作权、沙里洪译《桎梏》(1962)、李旭译《私生子》(1962)、李旭等译《印度尼西亚短篇

小说集》（1960）、李旭译《军人之妻》（1962）、李旭编译《罗罗·曼都传》（1962）等。¹⁷

然而，必须指出，由于印尼国内局势与马来亚的区别，以致于1950、60年代华社学习马来语运动和印尼语运动有着显著差异。其区别主要是参与主体、目的与性质这三个方面。

在印尼，学习印尼语运动的热潮，其参与主体主要来自华侨——侨居于印尼的中国人¹⁸。反之，在马来亚，则是华人的国家身份认同转型时，伴随而来的语言能力、身份认同的自我理解与实践上的调整。印尼参与主体是华侨之说，可从本文罗列的大部分文本都自称“华侨”，且效忠中国，得以证明。譬如《印尼语文》（1956）〈发刊词〉：“在印尼的华侨，是视印度尼西亚为第二故乡的……”（1956：3）同时代的其他语文刊物也如此，如《印度尼西亚语学习》等。至于马来亚的参与主体是认同马来亚的华人，参杨贵谊（2014）的论述，在此不赘。

正因为其参与主体的差异性，导致这两场语言运动所欲达致的目标也有所区别。学习印尼语运动，在1950、60年代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印尼民族。其同意要促进中印民族之间的了解，从而换取印尼华侨在当地生存的正当性，但其民族本位是中国，不是印尼。下引一段文加以说明：

何况**华侨的处境问题就不能孤立看待。这个关系着数十万华侨切身利益的问题，是祖国一向所关怀的。“保护华侨的合法权益”是我国宪法上明文规定的。我们相信，根据中印两国人民和政府牢不可破的友谊和愿望，华侨问题是应该也是必然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的。**

必须充分地认识：语言文字是沟通情感和友谊最重要的工具。祖国首长一再劝导我们学习侨居国的语言文字，以适应新的形势。唯有掌握印度尼西亚的语言文字才有可能与这个国度的人民友好合作，在今天就可以把我们华侨困难的处境反映给印度尼西亚朋友，让他们了解我们。

（思维1959：3；粗体为引者强调）

该文发表于《印度尼细亚语学习》，正值印尼华侨在当地权益受侵。当时人们普遍抱着学习印尼语文与文化，来换取华侨在当地的权益（如经商、华文教育等）。为了挽回华侨学习印尼语的信心，作者写下这篇文章。引文所见，作者的自我定位是华侨，其推动学习印尼语的目的，不是创造印尼民族，而是推进印尼-中国的跨国友好关系。其他例子，如《中印大辞典》序：“最后希望这本书能增进中印文化的交流并加强亚洲中印两大民族的友谊。”（温锡涛1951：无页码）；《简明实用印汉辞典》序：“我们编这部《简明实用印汉辞典》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广大华侨和华裔对于印度尼西亚语工具书的迫切需要，以便利他们学习印度尼西亚语；同时希望能对促进印、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与文化交流，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善努等编1963：6）

相对于此，学习马来语运动，对马新华社来说，却是透过本土文化的挪用，创造马来亚民族。综上，印尼语运动只能是印尼语运动，尽管印尼语已经是当地国语，但不是华侨的国语。反之，在马来亚，马来语运动是国语运动。此乃两地语言运动在性质上的差异。

无论如何，对于新生代如廖建裕，其身份认同已经与其他人有所不同，在他留学新加坡期间，他清楚理解，印尼是故乡而非侨居之地。如前所述，廖建裕留学新加坡南大期间，正好遇上当地华社积极地推广与学习国语，他所具备的印尼语能力，当下派上用场。加上他对印尼国内的文学、习俗与文化知识的掌握，足以让他能够在译介方面扮演角色。

从1959至1962年南大留学的短短几年，廖建裕（笔名：谷衣）的产量极高，根据手头上收集到的资料，至少有十余本。其中包括《印尼名诗选》（1959）、《印度尼西亚现代文学》（1959）、《爪哇民间故事》（1960）、《苏门答腊民间故事》（1960）、《印尼短篇创作选》（1960）、《怪鸟之子》（1960）（与曾荣盛合译）、《凯里尔·安哇诗选》（1961）、《马来亚的传说》（1961）、《现阶段的印尼文学运动》（1962）、《南苏拉威西民间故事选》（1962）、《爱情·眼泪·歌声》（1962）等。根据廖建裕的回忆，在他的第一本译作《印尼名诗选》出版前，市面上仅有两三部马来通俗读物的华文译本，如杨贵谊《为祖国立

功》、丁娜的《刀尖下的生命》，介绍印尼诗歌给马新华社读者，他很可能是第一人（谷衣1987：65）。

然而，正如前所述，马来亚的马来语运动是推广国语运动，作为印尼籍华人，他在此的参与，与大部分马新华人所持的立场、情感与位置，都相当不一样的。首先，廖建裕的本位是印尼，而非中国或马来亚。

马来亚的邻邦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历史久远的国家，马印两国之间的历史、民族与文化上都有血肉相连的关系。因此，要是我把印度尼西亚文学——印尼文化的一个环节，介绍给新马读者，我想不会是一件毫无意义的工作。

（廖建裕编1962：1）

对比差不多同时，印尼华人翻译者的想法，就可知道他与其同时代人的区别：“印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这是不能掩盖的事实；两个亚洲的兄弟民族的文化交流，正是消除隔阂，加深了解的不可或缺的工作。”（李旭等译1960：无页码）

同样的，廖建裕的位置与情感也与马新华人翻译者不一样。譬如，马岂（杨贵谊）在《行动周刊》发表的一段话：

……同时我们也是趁此向世人宣告，我们各族的人民，他们除了热爱自己的母语外，向来都是表示热爱以及支持自己国家语言的发展，我们热爱它，因为它是成为我国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工具，它可以把那种具有不同思想内容的民族文化、艺术以及风俗习惯等互相融合起来，使到我国几百万具有不同民族思想、风俗习惯的人民紧紧地团结起来、永远在互相扶持，互相友爱的气氛下，过着幸福、和平和安乐的大家庭生活，所以说语言是代表一个国家的灵魂。

（马岂1960：13）

此外，廖建裕亦曾坦诚，其翻译印尼文学、推介印尼文化的强大推动力，乃是出自对故乡的深刻怀恋。

我之所以将这些见不得人的译作收集成册出版，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将马来亚邻邦——印度尼西亚的文艺动态介绍给读者；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对故乡有深切的怀念！……印尼，这赤道上的光辉夺目的翡翠，一年到头都是春风和煦地吹拂着，每一个人的面庞。山永远是那么青；水也永远是那么绿……就是这富庶美丽的国土，哺育我的整个童年。在她的怀里，我曾经有过憧憬，有过梦幻。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如今虽寄身异域，也不免仍存有怀念。

（谷衣1960：74）

换言之，廖建裕在当时有着明确的“印尼本位”，清楚知道自己既非中国人，同时也意识到自己与新马华人的区别。然而，他却积极地涉入当地华社的国语运动中，这说明新马华社在独立建国时期，其追求的本土现代性有着“印尼经验”的参与，故此是一个跨语-跨国网络下的产物。

五、从新加坡到印尼：杨贵谊

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马来西亚华社展开了学习马来语（即国语）的运动。根据1960年1月20日《马来语月刊》创刊号〈发刊词〉的分析，马新华社掀起学习与研究马来语的热潮，主要与三件事相关。首先是1956年的第三届马来语文大会，提出了“言语是民族的灵魂”（Bahasa Jiwa Bangsa）；其次，马来亚独立后，宪法规定马来语为国语；最后，在李光耀领导下，新加坡自治政府积极提倡学习国语。而该刊的创办，正是为了因应时代的需求，帮助华人学习国语，促进华马交流。

当时马新华社出版了大量与马来语、文学、文化、历史相关的著述，透过译介本土性，除了促进各族群的了解，也创造新兴民族身份。其中包括各种单语、双语或三语期刊杂志，如《大学论坛》（马来文版）、《文化》、《马来语月刊》、《国语月刊》等；翻译方面，如拉迪译《一个女人之死》、白坚编译《马来四行诗》、楼文牧编译《马来民族的诗》等。还有其他许多有关本土马来习俗与语言的论述，如鲁白野的《马来散记》、

梅井的《马来人风俗》、《马来亚的兄弟民族》等。当时东南亚最高华文学府南洋大学，其学生积极地响应独立建国的呼吁，在大学初创期间，就表现出对马来语文的浓厚兴趣。他们不仅自组马来文班，还从事语文与文化的研究（杨贵谊2014；庄华兴2004，2008；吴小保2016a，2016b）。

杨贵谊正是在上述的独立氛围，成为南洋大学第一批学生。杨贵谊于1931年生于马来亚柔佛笨珍，自小在乡区长大的，邻里都是马来人，从小对异族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尤其是马来文。小学毕业后，他到新加坡升读中学。当时马新两地仍是英国殖民地，基于冷战的反共政策，马新与中国的交通管道被切断，政治氛围高压。杨贵谊在华侨中学念书时，因为本身的藏书而被逮捕、扣留、软禁。在此之前，他曾目睹日军在二战期间的各种恶行，并因战乱而辍学。因此，杨贵谊虽然不热衷于政治活动，却关心政治发展；并且因为多番遭到侵害，而对殖民主义深恨痛觉，萌发了他对民族自决独立的想法。无论如何，杨贵谊并不直接参与政党政治，反之透过文化活动，尤其是马来语文的教学与研究，提倡建构马来亚民族（杨贵谊2006）。

杨贵谊后来到南大念书，并因为掌握马来文，在校内校外开班授课。除了教学，他也从事翻译、编辑等工作，例如前文提到的马来文版《大学论坛》、《文化》等。除此之外，杨贵谊曾于1956年，以观察团成员身份，列席参加国际学生联合会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洲与非洲大学生会议”（简称亚非学生会议）。

我很高兴。因为第一，我的中选显然是因为我的马来文知识发挥了作用。第二，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以南大学生代表的身份出国访问，尤其是去印尼，一个我向往已久的国家。

（杨贵谊2006：163；粗体为引者强调）

杨贵谊在回忆录中表示，参加亚非学生会议，从代表团角度看，其最大意义是促进对世界各地学生的了解，与提高南大和南大生的知名度。但从个人角度看，“除了共同的任务和意义之外，我还心存一个更大的愿望，那就是趁此机会实地观察印尼语的发展情况，并收集印尼语文出版资

料。”（杨贵谊2006：163-164）

在当时，印尼已经透过战争取得了独立，整个社会还处于独立氛围中。看见印尼学生高唱〈哈罗，哈罗万隆〉这首富有革命精神的歌曲——号召人民团结，击退荷兰殖民主义，夺回国家主权——感染了当时的杨贵谊。

这样的歌曲，难怪会令英殖民主义者感到害怕，以致千方百计地阻止我们和勇敢的印尼民族交往，深怕我们受他们的斗争精神影响。不错，像这样激昂的革命歌曲，当然会激励我们更加坚决争取国家早日独立的冲劲。

（杨贵谊2006：167）

南大毕业后，杨贵谊曾到《南洋商报》担任记者，并于1961年自费前往国立印尼大学深造，修读印尼语文系，同时担任《南洋商报》印尼新闻通讯员，并发表了若干文章，如〈从印尼全面建设看该国大学教育〉（《南洋文摘》第二卷第九期）、〈国际学生汇集的印尼大学文学院〉（《南洋文摘》第二卷第十二期）等。在当时，选择到印大念书的南大校友，除了杨贵谊这类自费的，还有获得印尼政府奖学金的，如陈达生和廖裕芳。三人之外，后来陆续到印大深造的，还有陈潮盛、徐正强等（杨贵谊2006：245）。但整体上人数不多。

杨贵谊在印尼求学，不仅取得了丰富的印尼语文、文化知识，收集了大量的印尼文书籍，同时也使他掌握了词典编纂的技术与知识，日后成为了马来文专家、华马词典家。

浸濡在浓郁的印尼语言环境两年后，我觉得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从中我学到不少语文知识……关于词典编纂方面，在雅加达时，我曾到过语言与文学理事会办事处。如果没记错的话，那是附设在狄波尼戈罗路的国立印尼大学经济学院。在那里我看到了普瓦达敏达用卡片方式编纂的《印尼语大词典》的原稿。这种卡片编排法后来成为我的一部分词典编纂范例。

（杨贵谊2006：506）

因此，印尼对杨贵谊个人来说，是语言专家养成的文化中心。对社会而言，则是推动马来亚马来语/国语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外来养分。

六、本土现代性与其可能性

以上三个个案，分别代表不同的历史脉络与意识形态。胡愈之在印尼的流寓经验，是从相对的华文中心走向华文边陲地，但却为他打开了学习印尼语的机遇，成为印尼语专家，同时也透过译介本土性，促进马华社会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弱小民族的认识。这种认识背后的意识形态固然是中国本位的，但却带有世界主义因素，即支持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斗争。其“世界”必须置于冷战的资本主义旧世界与社会主义新世界的对抗脉络中理解。尽管胡愈之不能算是马来亚民族主义者，但其透过马来语/印尼语的学习与推广，以及译介本土性，却在马来亚民族塑造过程中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尤其在本土文库的丰富化方面。

至于廖建裕的新加坡升学经验，则是从相对的华文边陲走向华文中心。彼时正碰上马新华社的学习马来语运动，其所具备的“印尼经验”（语言的、文化的、文学的）派上了用场。故此，尽管自我认同是印尼人，却无阻透过马来语运动涉入马来亚民族主义运动，积极地在此运动中译介印尼的本土性，推动印马两国的关系。

最后，杨贵谊的印尼升学经验则是从马来文边陲走向马来文中心。透过在印尼深造获取“印尼经验”，并将此经验重新投入到马新华社的学习马来语运动，其代表的是马来亚本位。对杨贵谊而言，译介本土性，除了是以马来语作为促进各族群互相了解的语言；更重要的是，挪用区域的马来与印尼文化，来丰富化马华文化，使之本土化。这种本土化的目的是为了创造马来亚民族。

综上，无论是胡愈之、廖建裕或杨贵谊，都具备了不同内涵的“印尼经验”，尽管他们都有着不同的自我定位，却对译介本土性产生了积极影响，进一步地对马来亚民族产生了作用。

然而，这种“本土化”进程却常常遭遇挫折。1950、60年代，华侨社

会的印尼语运动是为了寻求在印尼生存的正当性，但透过“本土化”来展示善意、建立友谊的做法，却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其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尤有近者，即便像土生华人那般深层化的本土化案例，在1965年之前的苏卡诺时代，虽被接纳为印尼民族的部族之一，但在新秩序时代却被开除，不再是印尼民族。想要成为印尼民族，必须彻底放弃华人性、土生华人性，同化于印尼民族的其中一个部族（廖建裕2008：151-152）。

另一方面，马华社会的马来语运动也遭遇不小的打击。尽管并不如印尼般强势，主流马来民族主义者却主张马来-伊斯兰文化为马来西亚文化的核心，且马来语必须垄断公共领域的运作，在政府单位如此，在民间社会（乃至包括市场的私领域）亦希望如此。这种语言观念，虽然强调单一语言，却不否定多元文化，但前提是此文化的多样化必须以马来语来表述与承载，并且有着等级排序（以马来-伊斯兰为核心），是为一语多元文化（吴小保2013：第三章）。显然，与马来人的支配型语言理念不同，主流华社主张复合型的语言观念，即国语与族语同时具备公共性，尽管在功能上后者不如前者，譬如不具备跨族公共性（吴小保2016a）。

新加坡的情况则略有不同。1965年马新分家后，新加坡逐渐转向注重英语。虽然如此，马来语仍是法定的国语，并与英语、华语、淡米尔语同列为官方语文。表面上国家承认多语文化，四种语言并重。实则是英语至上，其他语言的使用空间渐渐地萎缩。文化领域更是如此。以马华文学为例，潘碧华就曾粗略统计，从19世纪末至马新分家，马华文学的实际中心其实是在新加坡。至1970年代分家后，新华文学的创作还在马华文学之上。1980年代，新华文学与马华文学平分秋色。但到了1990年代，马华文学的创作活跃度渐渐超越新华文学，进入21世纪，两者差距进一步扩大（转自张森林2017：5）。

无论如何，且撇开新加坡，单就马来西亚与印尼案例看，这是否说明在华人社会“本土的不可能性”或“不可能的本土性”吗？

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理解本土？正如本文指出，本土不能局限于一国之内看待，必须置于区域的跨语-跨域网络中理解，否则就会有所偏差。举个例子，尽管赞赏威北华（包括骆起东）的小说成就，苗秀却未把他

们的小说收入《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五集）小说（卷二）》中，理由是：“他们写得最好的小说，反映的都是印尼社会的现实，不合我们的编选的标准，因此不得不割爱了。”（苗秀1971：13）僵化的国家本位往往忽略或意图排除跨国经验，但这是有问题的。正如前文所论，马来（西）亚华人的本土性，从经验上看本身就是个跨国的产物。故此，本土性不能不借助跨语-跨域网络（同时不轻易否定国家的作用）来理解。进一步地说，本土性的时间意义固然是指“现代”（指回应当代挑战）而言，但空间意义却不必然局限于“国家”，而是跨地域的。

其次，本土被挪用为建构民族认同的手段¹⁹，即本文的“本土现代性”，它至少指向两个不同层面的意思：首先，它跟权利与义务的交换原理有关，指透过本土化（作为义务）换取国家的承认（作为权利）。这是发生在“承认的政治”层面的问题，它牵涉到公民的各种不同权利的安排，如个人权利、政治权利、公民权利与社会权利等。用一句高度概括的话来说，就是“公民能差异而平等吗？”（黄进发2015）但这问题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学术问题，不如说是政治问题。只要国家不同意，任何权利就有可能被剥夺。²⁰

本土现代性另一个层面意思，是指在文化上有意识吸纳外部文化，以丰富化自身的语言文化，以便能够回应当下社会的挑战。就此来看，其带有明显的世俗或入世性格（而非出世性格），关注的是此岸（而非彼岸），因此必然与经验（而非先验）、变化（而非永恒）、流动（而非固化）相关。换言之，它具有公共性，意即指人与人之联系，以及人与世界之联系的性质。故此，所谓在地，如前所述，从经验角度看，不必然以国家为其界限，但却不轻易否定国家的客观作用。而这样的本土性认知基本上不仅是个实践命题，也是个认识的命题，即我们如何理解与认识相关群体的“主体性”。

只要存在主观的意愿以及成熟的客观条件，第二层面的本土性意义就不会因为不被国家承认而被剥夺。本土性虽然会遭受国家打压，却能够动用资本与社会资源，来加以回应。华社之所以能够办教育，正是透过社会的、资本的力量，与国家相抗衡。故此，主体性正是在资本-社会-国家之

三环相扣的结构中，形成一种粘合与张力关系，相互制衡，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变数。因此，我们断不能轻易以决断论方式认定国家对本土性的剥夺或否定，就必然会对主体形成负面影响；它其实亦可能形成正向作用。进一步说，从政治或社会文化运动角度看，本土性恰恰是被压迫者的反抗资源，正如许多反殖民运动，本身就意味着一场本土文化的发现之旅，或本土文化的复兴运动。

注释

- 1 在本文，本土现代性被理解为“挪用本土资源来建构现代民族身份”，它可以是透过语言的学习、译介等各种方式内化本土资源。其“现代”意义不仅仅因此“本土化”过程发生于现代的时间意义以及其与自身所处社会的空间意义，同时也指其在精神上积极介入公共领域，回应各种当代挑战的政治文化行动。
- 2 这里借用了晚近华侨华人研究提出的“网络论”。网络论的提出，起初是为了克服国家论的不足。一般而言，国家有三个不同层次的意义。首先，作为民族意义上的国家（Nation）；其次，作为地理意义上的国家（Country）；其三，作为政治意义上的国家（State）。与此不同的是，网络的建立基础是“原生性认同”（Primordial Identity），即构成华人网络的一些基本资源，是地缘、血缘、业缘、神缘、学缘等关系，国民身份认同对华人网络不具决定性意义。其次，主权与国境对于网络似乎没有特别的意义，因为网络空间以越境和跨国的横向联系为主。最后，相对于制度、权力体系和上层建筑，网络更多地属于社会空间，一种非国家的空间（廖赤阳、刘宏2008：2-3）。以上这三点跟本文的研究取径有亲和性，例如本文所谈之“马来亚民族主义”，是从社会领域角度切入，而非国家层面的政治领域。
- 3 马来语运动是个长时段的语言运动，起始自19世纪中末期，殖民现代性诞生之后，其乃是透过语言的现代化来达到民族自强。在不同历史阶段，此语言运动呈现不同精神面貌，例如在反殖民时期，是作为反殖民运动的一部分。在独立建国/后殖民时期，则转变为国语运动。在本文，马来语运动与国语运动将视文脉而交互使用。“国语运动”呈多重性面貌，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对其有不同的理解与主张，这包括华人与马来人、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区别。对一些马来民族主义者而言，主张“马来语为国语”之目的是为了强调马来人主权地位，对左翼马来民族主义者，则是欲透过“马来语为国语”促成沟通共同体之形成，并创造平等的民族身份。华人方面，其主张亦因意识形态而有差别，一些左翼分子主张学习国语，但反对消灭华文教育，也有些左翼华人主张在概念上反对“国语”。详参吴小保（2016a；2016b）。

- 4 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对马来亚民族意识会有不同歧见，例如左翼民族主义者很可能认为亲美的“马来亚民族主义者”是国内反动派、英美帝国主义走狗、新殖民主义的帮凶，因此不能算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鉴于左右之争非本文重点，我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使用“马来亚民族意识”一词，意指认同于马来亚与新加坡，争取独立建国，希冀透过各民族，包括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的相互了解与团结，学习与推广马来语为国语，建立一个共同的马来亚民族。在此使用民族而非国族，乃强调，相对于国族往往含有国家主导之意义，民族则含有由社会自主之意义。
- 5 战后最早一批主张华侨应学习马来语者，其实是鼓励华侨同时学懂“阿拉伯式”、“英国式”和“荷印式”拼写系统，例如林之文的〈谈印尼语〉就认为，由于“马来亚出版政治性的读物很少，连马来人读的东西也是要从苏门答腊和爪哇运来，所以，你要学习印尼文一定得再多两三个钟头认识荷印式的拼法，那才行。”（《风下》第60期）不过他也表示，应该从“英国式”入手比较容易。1950、60年代，杨贵谊曾与朋友有过类似的争论，他认为初学者应从学习罗马字母马来文开始（杨贵谊2006：104-110）。
- 6 不仅是马来左翼在关注印尼语与马来语的统一，当时华人也相当关心此课题。例如有读者去函《马来语月刊》的“Jawapan Pak Sulit”栏位，询问“印马语文是否一定要统一？”编辑回答时指出：印马语文的区别只是技术性问题，假设两种语言得以统一，将来两地出版的书籍就可以统一拼音印刷，书籍市场也可以一体化，不必经过翻印工作。从文化交流角度看，其收益亦甚可观（《马来语月刊》第79期）。
- 7 威北华足迹遍布印尼各地，包括苏岛、雅加达等，详细的爬梳参张景云（2016）。根据苗秀（1971），威北华居于棉兰时开始从事文艺创作，与骆起东等人参与过印华文学运动，并曾与当时流亡苏岛的郁达夫有密切往来，深受其影响。这都是说明马华文学中的印华文学（或反之）的真实例子。
- 8 诚然，胡愈之不能代表所有避难印尼的文化人。例如巴人后来认同于印尼，投身印尼独立运动，与胡愈之经验完全不同。无论如何，本文无意建构南来文人的诸种文化模式，而仅仅希望说明“印尼经验”对马来亚民族主义或学习马来语运动之作用。本文之所以选胡愈之，乃是为说明“印尼经验”对南来文人的影响，以及此经验如何对马来亚的马来语/国语运动起到先驱作用。在众多人物中，胡愈之颇具代表性，一方面固然因为他是当时文坛的翘楚，掌握了重要社会资源，如创办《风下》、《南侨日报》，发挥影响力。另一方面，他曾于1947、48年以笔名沙平参与“马华文艺独特性”大论争，凸显其以中国为本位的左翼世界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以上种种，都与本文另外两个个案认同于印尼与马来亚相当不同。
- 9 本文关于胡愈之的生平，主要参考其自述，以及若干与胡生前有交往者的回忆文章，见费孝通、夏衍（1989）、胡愈之、沈兹九（1985）、胡愈之（1990）。关

于胡愈之的研究，参崔贵强（2012）。

- 10 根据崔贵强的考察，《南侨日报》有限公司的创业资本为50万元，分1万股，每股50元。股东以新加坡商人为主，也有少数马来亚和印尼的华侨（崔贵强2012：8）。此外，《南侨日报》的读者不局限在马新，也包括苏门答腊。例如1947年11月21日，《南侨日报》就刊登一名篇署名罗斯丁的苏门答腊读者的来稿（崔贵强2012：19）。这都说明当时在文化事业方面，资本与市场的一体化现象。
- 11 《风下》对东南亚课题给予优先的关注，也不完全是编者主导下的结果，背后也有来自读者的催促，第124期的〈今后的本刊〉就提到：“差不多一致的意见是本刊反映马来亚现实太不够。这一点我们完全承认。今后我们当努力改进。现在本刊正在征求各种描写马来亚及南洋各地客观情形的稿子，就是想在这一方面稍微有一点贡献。至于反映马来亚现实的文艺作品，我们也将多多刊登。”
- 12 之文的原名不详，有人认为这是胡愈之的笔名，见庄华兴（2004b：71）。但也有可能是林子文的笔名，林氏曾于战时与胡愈之流亡到苏门答腊，回中国后曾教授华侨印尼语。关于林子文的事迹目前见到的并不多，参沙平（1951：3）。
- 13 根据廖建裕的研究，21位第二代中国东南亚学者中，就有十位是海外归侨，其中多数是印尼华人（2008：27-54）。
- 14 廖建裕自南大毕业后，返回印尼继续深造，攻读印尼史，之后出走到西方国家升学，毕业后回到新加坡担任东南亚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教授、华裔馆馆长等。如今已是新加坡公民。他曾以“漂泊了许多年，终于落地生根”来宣告其离散漂泊的终结（谷衣1987：1）。
- 15 其他从印尼到新加坡发展的人，如李全寿，从1950年代起就参与印尼语运动，并出版了若干语言课本与介绍印尼民俗的书，如《印尼语语法读本合编》。他后来又在新加坡出版《现代马来语》、《马来语读本文法合编》，与前述印尼语书内容大同小异。另，根据杨聪荣，李全寿早年在中国留学时，与陈马六甲是集美（Chip-Bi）室友（杨聪荣2000：176）。
- 16 包思井与胡愈之等人相熟，曾在生活书店任职，战时曾在印尼流寓，因此习得印尼语，并与当地社会建立联系。在学习印尼语运动进行时，他也成为了其中一位重要的参与者，编著译了好些语法书与辞典。
- 17 必须指出，相关编译者都是印尼华人，但出版地点未必都是印尼，部分是透过香港出版社出版。这与战后香港崛起成为中文图书出版中心的背景有关。实际上，有很多马新华社的华马译作也是在香港出版的。
- 18 至于土生华人，他们与华侨属不同群体，早已掌握印尼语，不需要再学印尼语。土生华人在19世纪中晚期开始，在印尼文坛大放异彩，做出重大贡献，参Salmon, Claudine（2010）。
- 19 从翻译马华理论角度看，华译马是在异文化中宣告马华主体的在场，马译华则是文化养分的输入。这部分与“本土被挪用为建构民族认同的手段”是同个道理。相关翻译主张见庄华兴（2001）。

- 20 必须补充说明一点，不是全部权利都必须以对等的义务来换取的。一些权利不能因为某人不承担义务而被剥夺，例如基本人权，它跟公民身份概念下的权利概念有别。

参考文献

- 程次芳等编著1954。《实用印尼语》（第一册）。椰城：世界出版社。
- 崔贵强2012。〈胡愈之在新加坡的岁月1945-1948〉。《历史·人物·山河》。出版资料不详。
- 〈发刊词〉1956。《印尼语文》（创刊号）。页2-3。
- 费孝通、夏衍等著1989。《胡愈之印象记》。北京：友谊出版社。
- 《风下》（1946-1948）
- 谷衣1960。《印尼短篇创作选》。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
- ____1987。《我不是过客》。新加坡：长河书局。
- 黄进发2015。〈公民可以差异而平等吗？马来西亚的69年纠结〉。载《大马华人与族群政治》。台北：联经。页131-150。
- 胡愈之、沈兹九1985。《流亡在赤道在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胡愈之1990。《我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
- 廖赤阳、刘宏2008。〈网络、认同与东亚地域秩序：反思二十世纪华侨华人研究〉。收入廖赤阳、刘宏编。《错综于市场、社会与国家质检：东亚口岸城市的华商与亚洲区域网络》。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八方文化创作室。页1-34。
- 廖建裕编1962。《现阶段的印尼文学运动》。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
- ____2008。《东南亚与华人族群研究》。新加坡：青年书局。
- 《马来语月刊》（1960-1970）
- 马岂1960。〈继续发扬国语周的精神〉。《行动周刊》第31期：12-13。
- 苗秀1970。〈导论〉。苗秀编（1971）。《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五集）小说（二）》。页1-15。
- 善努等编1963。〈序言〉。《简明实用印汉辞典》。雅加达：觉醒文化基金会。页5-7。
- 沙平1951。《印度尼西亚语语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 思维1959。〈坚持学习印度尼细亚语——和苦闷彷徨中的朋友谈心〉。《印度尼细亚语学习》（第3期）。页2。
- 堂勇1962。《鲜花怒放》（阿斯拉夫编）。新加坡：白云文化社。
- 吴小保2013。《华裔马来西亚作家的马华文学与马来文学身份认同》。博特拉大学中文文学硕士学位，未出版。
- ____2016a。〈国语运动的多重性：马、新华巫语文菁英的语言理念分析〉。《台湾

- 东南亚学刊》(11: 2)。页107-140。
- ____ 2016b。〈冷战与马来亚左翼(反)国语运动〉。《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18-19合刊)。页121-152。
- 温锡涛1951。〈自序〉。《中印大辞典》(上册)。椰城: 南北文化出版社。
- 杨聪荣2000。〈郁达夫与陈马六甲的越境之旅〉。《中外文学》(第29卷第4期)。页155-196。
- 杨贵谊1961。〈国际学生汇集的印尼大学文学院〉。《南洋文摘》(第二卷第十二期)。页22-23。
- ____ 2006。《杨贵谊回忆录: 胶童与词典》。吉隆坡: 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
- ____ 2014。《华马文化论丛》。吉隆坡: 华社研究中心。
- 张景云2016。〈编者序〉。张景云编《威北华文艺创作集》。八打灵再也: 有人出版社。
- 张森林2017。〈新马华文文学研究的跨界交流〉。《季风带》(第三期)。
- 赵稀方2012。《翻译现代性: 晚清到五四的翻译研究》。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 郑扬祿1959。〈印度尼细亚语与华侨〉(斯明译)。《印度尼细亚语学习》(创刊号)。页7-8。
- 庄华兴2001。〈马译华文文学: 文化主体认知的解读〉。收入《人文杂志》(十一月号)。页108-116。
- ____ 2004a。〈南大学人与马来语文发展: 廖裕芳和杨贵谊的贡献〉。收入李业霖编2004。《南洋大学史论集》。八打灵再也: 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
- ____ 2004b。〈文学史与翻译马华: 政治性与定位问题〉。收入张锦忠编2004。《重写马华文学史论文集》。南投: 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 ____ 2008〈马来西亚华裔作家与现代马来语文学〉。见《中外文化与文论》第二期, 页112-127。
- 庄钟庆2007。《东南亚华文新文学史》。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Ahmat Adam 2013. *Melayu, Nasionalisme Radikal dan Pembinaan Bangsa*. Kuala Lumpur: Universiti Malaya.
- Abdullah Sanusi 1966. *Peranan Pejabat Karang Mengarang: Dalam Bidang2 Pelajaran Sekolah2 Melayu dan Kesusasteraan di-kalangan Orang Ramai*.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 Harun Aminurrashid 1966. *Kajian Sejarah Perkembangan Bahasa Melayu*. Singapura: Pustaka Melayu.
- Ismail Hussein 1966. *Sejarah Pertumbuhan Bahasa Kebangsaan Kita*.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 Jumaat 1989. Daripada PBmPB Hingga DBP: Renungan Terhadap Sejarah Perkembangan Organisasi Bahasa dan Sastera Melayu. Ucapan Utama Seminar Seratus Tahun Pergerakan Bahasa-Sastera Melayu di Malaysia.

- Mohd. Sarim haji Mustajab 1989. Elit Pentadbir dan Persoalan Bahasa Melayu: Satu Episod dalam Sejarah Negeri Johor. Dianjurkan oleh Majlis Kebudayaan Negeri Johor: Seminar 100 Tahun Bahasa-Sastera Melayu di Malaysia.
- Salmon, Claudine 2010. *Sastra Indonesia Awal: Kontribusi Orang Tionghoa*. Jakarta: Kepustakaan Populer Gramedia.
- Syed Hussin Ali 1959. *Pertubuhan2 Bahasa dan Sastera Melayu di Singapura Selepas Perang Dunia II (Khasnya ASAS 50)*. Singapore: Latihan Ilmial untuk Memenuhi Keperluan Kelulusan B.A. (Hon) JabatanPengajian Melayu, Universiti Malaya.
- Syed Nasir 1967. Pendahuluan oleh Pengarah.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Sa-puluh Tahun.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 ____ 1957. Dengan Ini Saya Hidangkan Majallah Dewan Bahasa, *Dewan Bahasa* (1:1). Pp. 5-7.
- Wong Ling 1960. Terkenang Kapada Guru. *Dewan Bahasa* (4:2). pp. 135-137.